

「一個中國」兩難的「雙贏」解決方案

耿 慶 武

(多倫多大學管理學院亞太高階管理部主任)

摘 要

首先，本文擬應用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理論模型在對局論(Game Theory)架構下分析兩岸關係的現況與癥結，再就對解決兩岸關係之僵局，試圖以案例分析方式提出若干簡單分析模式與雙贏策略方案：提升「一個中國」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終極理念目標，以奠定兩岸積極發展經濟關係的三十年時間；兩岸的政治統合問題，應留待2030年代的兩岸人民與執政者去解決。其次，本研究將進一步研究分析兩岸經濟整合的階段與時程，兩岸經由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單一貨幣與政策協調等幾個自然階段的經濟整合後，自然可奠定未來協商政治統合的基礎。作者認為，兩岸經濟整合的時程自今起應需時約三十年，2030年代時的兩岸政治環境將大不同於目前，而兩岸三地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差異亦將較目前大為縮小。當大中華經濟圈內的各種差異逐漸消失時，兩岸三地的政治統合是否仍像目前一樣地受到兩岸執政者與人民的重視，則不得而知。因此，一個不預設結論的演進與開放式(adaptive and open-ended)之兩岸整合過程與協商方式，應該是兩岸現今可知的最佳雙贏策略。

關鍵詞：「一個中國」、兩岸關係、奈須均衡、策略規劃模型、經濟整合

壹、前言

世紀之交，冷戰雖然已結束，整個世界似乎也已進入以和解代替對抗，以合作代替敵視的新世紀。但是，在人類繼續追求物質生活充裕與精神生活文明的大勢中，全球還有許多國家與人民卻仍然生活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以亞洲太平洋地區而言，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似已因南北韓元首的會面，而有降低的趨勢；但臺海兩岸的政治與意識型態的對抗，以及南海島嶼主權的紛爭，都有引發軍事衝突的可能。其中尤以臺海沒有任何多邊安全對話機制存在，更有可能引發嚴重危機。為了避免臺海問題成為地區衝突的引爆點，臺灣海峽兩岸的政府須責無旁貸地運帷籌幄，化當前潛在的危機為日後兩岸合作的轉機。

首先，本文擬應用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理論模型在對局論(Game Theory)架構下分析兩岸關係的現況與癥結，再就解決兩岸關係的僵局，試圖以案例分析方式提出若干簡單分析模式與雙贏策略的初步建議。¹ 本文認為兩岸關係的癥結在兩岸執政者對兩岸間相對的政治地位之爭。兩岸對「一個中國」爭議的癥結，在於兩岸執政者及其支持者的基本理念無法妥協。此一不戰、不和、不妥協的僵局是一對局論所謂的「奈須均衡」(Nash Equilibrium)現象。此一雙方均無法再讓步或妥協的僵持不下的對峙情況，只要原有的外在環境不改變，就會繼續下去。若以西方管理學的決策理論(Decision Theory)中的策略規劃模型(Strategic Planning Model)來解釋，中共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²為其戰略使命(Strategic Mission)，將無法也不可能因臺灣

1. 本文部分內容已發表於 2000 年 5 月 10 日在臺北發行的《聯合報》。

2. 中共對「一個中國」的說法，存在對外和對兩岸等兩種版本。在對國際社會闡述「一個中國」定義時，中共都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三段論表述；在兩岸間，中共對「一個中國」的定義較寬鬆，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

執政者戰術性的手段或讓步，例如陳總統的放軟身段、小三通、開放大陸記者來臺、放寬或取消戒急用忍政策、大三通等政策，而有所改變。因此臺灣執政者若欲用該些戰術層次的政策來改變中共戰略層次的「一個中國原則」，非但無法成功，更將蹉跎時日徒然耗盡臺灣手中的談判籌碼。

兩岸既然在現階段的民意與意識型態下無法就中共所堅持的戰略層次的時代使命 - 「一個中國原則」達成妥協，就應該超脫該層次，向更高層次的理念 - 願景(Vision)尋求解決方案。本研究建議兩岸與其各自試圖硬性定義「一個中國原則」，不若將「一個中國」提升為兩岸共同追求的一個軟性理念目標，亦即策略規劃理論模型中所謂的「願景」。在該共同願景下，兩岸可各自尋求其可接受的階段（時代）使命(Mission)與施政目標(Goals)。若臺灣人民接受「一個中國」為兩岸關係的終極願景，在可預見的未來，非但沒有任何實質的損失，更可換取中共實質的讓步，而使民進黨政府現今陷入兩岸僵局，以及面臨企業外移的財經困境，順利解套。而中共方面亦將因民進黨政府的承認（或不否認）「一個中國」，非但對其國內強硬派人士有所交代，更可換取臺灣對大陸各種經貿限制的解禁，使大陸獲得實質的經濟利益。因此本研究認為心理上對「一個中國」的認知(Cogni-

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不容分割」三段論形容。近兩年，在擴大兩岸政治接觸基礎的考量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曾就「一個中國」提出八十六字解釋，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中共對外的「一中」三段論，主要是強調主權完整，而中共則是行使中國主權的代表；而兩岸間的「八十六個字」版本，則似乎主要是為兩岸談判尋找共同基礎。本文中所謂的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乃以上述二定義為主。而錢其琛先生最近所謂的兩岸均為中國的一部分，應該為其統戰性的宣示，臺灣方面不應過份樂觀。

tion)，是兩岸耗費最低政經與社會成本的「雙贏」解決方案。³

兩岸現今的政治關係既為一奈須均衡僵局，因此在兩岸政治意識型態對抗僵局未解除前，唯有以兩岸文化經濟關係的自由化（逐漸解除各種禁制以及各種法令規章的鬆綁），來有效降低兩岸政治關係的緊張對峙局面。強化的兩岸經濟關係亦可逐漸軟化兩岸間的政治僵局，而利於建立未來談判環境，兩岸統合關係的建立應將是一個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的長期人文整合過程。本研究建議臺海兩岸應採行「先經濟後政治，先區域後全國」的一種演進與開放式的(adaptive and open-ended)統合方式，即先協商區域經濟整合，再視區域經濟整合的經驗與成果，決定是否進行或如何進行下一階段的政治統合談判。此方式的「演進式」特點是，兩岸三地可視其本身的需要，先自經濟與社會結構開始，一項一項地與對方協商，以分別達成各項的共同協議。假以時日，最終可使得兩岸間的所有經濟事務，在經由一個雙方共同認知的經濟與社會機制下協調、合作與和諧運行。此一演進式的統合談判過程，將給予兩岸人民與政府充分的心理準備與調整時間，而所達成的協議必定是對雙方均有利的協議，因此永遠是「雙贏」。而不預設結論的開放式的協商原則，則將使雙方均有足夠的時間與迴旋空間，以各自協調其內部的各種意見。最重要者，此一演進與開放式的整合經濟方式，並不需要改變兩岸現有的政治體制與主權現狀。

至若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本研究認為應依循經濟整合的自然步驟，由建立自由貿易區開始，而逐步經由關稅同盟、共同市場、單一

3. 此一解決兩岸關係僵局的心理辦法，基本上是蔣緯國將軍所主張的戰略四大要素：「政、經、軍、心」的心戰要素。在兩岸的政治對抗、經濟競爭與軍事對峙均陷入無法再讓步與妥協情況下，兩岸似乎應反求諸己，跳出代價甚高的，硬碰硬式的實質鬥爭之惡性循環，而自心理上尋求軟性的或虛擬的(virtual)解決方案。

貨幣等階段，而達成各種經濟與社會制度的融合。本文並預估，兩岸達成類似歐洲聯盟諸國現今的經濟整合狀態，應再需約三十年的時間。到 2030 年代時，兩岸的執政者都將換為受教育且成長於兩岸重新開始雙向交流（1987 年）以後的世代。屆時，兩岸的政治環境或將大不同於目前，而且兩岸三地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差異亦將較目前大為縮小。當大中華經濟圈（大陸、臺灣、香港與澳門四區域經濟的聯集）內的各種差異逐漸消失時，政治統合是否仍像目前一樣被兩岸執政者與人民在意識型態上所重視，則不得而知。因此，雖然吾人預估在 2030 年代，兩岸應將已具備協商政治統合的客觀條件與環境，但兩岸是否實際進行政治統合，仍須視當時兩岸執政者與人民的主觀意識與客觀需要而定。任何以目前的經驗、資訊、知識與意識型態所做的兩岸政治統合的宣示、方法或規劃，似均為主事者現今主觀的期望、臆想與蠡測，而不具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實質的說服力。

本文第二節將較詳細闡釋策略規劃理論模型中願景的意義與功能，以及應用對局理論中的奈須均衡現象分析兩岸現存的僵持關係，並建議以軟性且不需詳細定義的「一個中國」為兩岸共同願景（終極理想目標）；第二節則比較詳細地討論此一建議的可行性；第三節則應用決策理論的策略規劃模型以案例分析方式來討論兩岸的「一個中國」策略規劃的可能方案。利用該一理論分析模型，吾人進一步分析指出臺灣執政者現今已宣佈或正在擬議中的兩岸政策，俱為戰術層次的短期政策，所以無法解決戰略層次的「一個中國」之爭議。因此建議臺灣執政者應先尋求國內主流民意對「一個中國」的認同，再尋求與中共就該議題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而權衡臺灣內部主流民意對「一個中國」的接受程度，以及中共可能的讓步空間，本研究建議兩岸將「一個中國」提升為兩岸人民的一個長期共同努力的理想目標，用較現代的術語來講，該理想目標即為兩岸共同的終極「願景」。

第四節總結本研究對兩岸經濟整合方式的構思與建議，並預估兩岸經濟整合階段的時程。本研究建議兩岸採取演進開放式統合方式，

先經濟後政治的逐步完成兩岸統合的漫長「人文融合工程」。在此一漫長的整合過程中，不論是兩岸的政治生態、經濟與社會結構，以及人民心態或是世界局勢與國際關係，均或將產生無法預知的變化，因此與其草率地預定未知的整合時間與議題，不若採取更切合實際的經濟自然演進的整合方式。所以，兩岸的整合過程，應只有規劃性的階段，而不必事先預定時間表，因為談判雙方均無法預知未來談判的結果與所需的時間。吾人建議的演進且開放式的統合過程，事實上與大陸過去二十年來，在無法預知「改革開放」的進度與結果時所採行的「摸著石頭過河」政策制定原則相同。

貳、兩岸關係的現狀與願景

兩岸關係的癥結，簡而言之，在於兩岸執政者與主流民意在心理上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不同，而衍生出的種種意識形態之爭與實質的對抗。「一個中國」或「中國統一」問題的起始，應該是1940年代國共內戰後，中國分裂成在大陸的中共政權與在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開始。後又歷經蔣中正與毛澤東時代的「光復大陸」與「血洗臺灣」、蔣經國與鄧小平時代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及李登輝與江澤民時代的「李六點」與「江八條」等三個主要階段的對抗；兩岸關係由流血戰爭，到隔岸武力對峙、外交鬥爭，以至開始間接交流、通商與半官方對話。此一迄今已歷時五十一年之既漫長又艱辛的兩岸關係發展過程，自然不能寄望於一向持臺灣獨立理念的陳水扁總統在有限的執政時間內完成。國際上及兩岸人民應早已有此一客觀的認識，而中國大陸政府的領導人，更早已有「摸著石子過河」（聽其言，觀其行）的心理準備。

一、兩岸政治關係現狀是一「奈須均衡」

曾經在兩岸間與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的特殊兩國論，隨著民進黨新政府陸委會主委蔡英文博士在未就職前（2000年5月初）即宣稱：

「未來將不再提『特殊國與國關係』以避免大陸誤會」，基本上已回到十個月前該論提出前的原點。而近年來喧囂非常的「一個中國」爭議，似乎亦隨著陳水扁總統宣稱：「新政府無意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而復歸於十年前李登輝總統頒佈國統綱領時代。若綜合陳水扁總統就職後的公開談話，以及臺灣各階層人士對兩岸關係定位問題的討論與建議的可行性看來，陳水扁政府現今的最佳選擇似乎仍是以重新確認或不否定 1992 年香港會談結論為最可能。事實上在就職後五星期左右，陳水扁總統已公開宣佈認同 1992 年兩岸所達成的「沒有共識的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且於 2001 年元旦公開表明，若得到中共當局善意回應，願意與中共開始協商政治統合的可能。⁴

4. 見 2000 年 6 月 29 日《聯合報》。陳水扁總統在 2000 年 5 月的就職演說中提到「在既有基礎上共同處理『未來』的一個中國」；於同年 12 月 31 日發表元旦祝辭時，則提到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一個中國」原本不是問題；又提到，「兩岸原本是一家人，既然希望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強烈暗示性用語。2001 年 8 月 10 日他會見美國參議員邦德時再進一步指出，「兩岸問題要進一步解決，也一定要依中華民國憲法的思維來定調，如此才能化解兩岸的歧見，這也是兩岸政府與人民所能接受所謂『一個中國』的答案。」

陳水扁總統 2001 年 8 月 31 日在總統府接見來臺參加「亞太安全國際論壇二一年臺北圓桌會議」與會外賓時表示，「願意找出兩岸可共同接受的『一個中國』的內涵。」這似乎顯示他已更明確地表白願意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方式處理一個中國的問題。他表示，希望兩岸在「民主、對等、和平」的三原則下，找出雙方都可接受「一個中國」的內涵。這種說法已近似在野黨和中共所提的「九二共識」中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雖然尚不及中共所要求的「一個中國」的定義，但陳水扁的兩岸政策趨向於有條件接受「一個中國」之意圖已經甚為明顯，所差的僅是選擇最有利的時間而已。

就連任策略而言，吾人估測陳水扁似在明年下半年，亦即下屆總統選舉的一年前若提出突破性的「一中」政策，則經過一年的運作，至 2003 年底總統大選時，或許可在兩岸政策上，使其執政表現有加分的機會。吾人亦認為

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在 1993 年至 2000 年李登輝總統執政的後半段期中，雖集國內外雋智幕僚的精華，亟思突破，但最後似乎又回到了原點。是歷史與命運作弄人？亦或是人謀「過當」或「不及」？

李登輝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自頒佈國統綱領於 1993 年辜汪新加坡會談後，為因應臺灣內部的臺獨勢力，或者也因為李總統本身的使命感，從倡導「中華民國在臺灣」，到推動務實外交（親自出國訪問進行元首外交、推動臺灣進入聯合國及以私人身分訪美等），以至於 1999 年「特殊兩國論」的提出，均是在不照會彼岸情況下，欲單方面突破兩岸原有的政治外交上的僵持關係。但是終其執政年限，李登輝總統領導下的臺灣的國際關係，除在經貿上有所斬獲外，正式邦交國非但未能增加，反而急劇地減少（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南韓等中型國家均已棄中華民國而去）。更因「特殊兩國論」的提出，而使以美英法等主要西方國家自 1999 年開始首度一致公開反對臺灣進入聯合國的提案。李登輝總統單方面欲突破兩岸關係原狀的試圖，可以說經過了一些迂迴的道路，又回到了原地 - 兩岸政治定位爭議之僵持。

而大陸方面，在過去數年間，北京當局為因應臺北當局突破原有關係的嘗試，也單方面進行了一些改變兩岸關係原狀的嘗試，其中較明顯且具代表性的包括 1995 與 1996 年間的「文攻」與「武嚇」，以及在 2000 年初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中增列臺灣長期拖延談判為中共對臺動武的條件之一，結果大陸當局亦相同地嘗到了國際上尤其是來自美國與日本的強烈反應。前者，非但沒有改變臺灣方面既定的政策路線，反而凝聚了臺灣人民對中共的反感，而間接地幫助李登輝總統在 1996 年高票當選，成為第一位人民直選的「臺灣人總統」。而北京「準動武」式的「飛彈試射」更將其所一向

，在下屆總統選舉前，兩岸關係是陳水扁政權唯一可有所突破性政策表現的機會。臺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因涉及長久以來所累積的結構性調整，似已無法在短期（二至三年）內有所突破。

宣稱的「臺灣問題」為其「國內問題」，帶到了美國出動航空母艦準備武力介入的「國際問題」層次。即使是採取「書面威脅」的後者（「白皮書」的發佈），因增列了「拖延談判即動武」的新條件，亦受到美日等國的嚴重關切。大陸單方面欲改變兩岸關係現況的試圖，也同樣地在得不償失的情形下無疾而終。⁵

以上的事實很明顯地例證了對局理論中的「奈須均衡」現象 - 對局的雙方中的任一方，欲單方面改變原有的僵持狀態的結果，均將得不償失（即任一方改變均衡現狀所需付出的代價均大於均衡狀態改變後該方所得的收穫）。因此雙方在各自執行各種改變現況的嘗試後，發現原來「不滿意」的僵局，仍是在客觀環境未改變下，唯一被雙方同時「可接受」的狀態。雙方在無法溝通合作或協商達成妥協的情況下，唯一可行的最佳策略就是保持原有的雖不滿意但卻可免強或無奈地接受的各說各話的爭議現狀。此一「僵持性」均衡情況，亦可詮釋為雙方在現存環境的主客觀條件下，均已選擇了最佳策略；因此只要大環境維持不變，參與對局者即無法再因單方面的策略調整而獲得任何實質的戰果。

兩岸當前的政治關係（包括主權與外交等）架構，事實上可用對局論中的一個簡單模型 - 非合作的完全資訊靜態對局(Non-cooperative full information static game)來類比。此一理論模型的「完全資訊」之條件，基本上符合兩岸雙方執政者均為「聰明的政府」之事實：兩岸政府均投入大量人力與預算，充分蒐集與研究對方可能採取的行動，也有足夠的資訊（如情報網、資料庫、間諜衛星，以及美國的居

5. 中共發表的白皮書中增列的「拖延談判即動武」條件，在朱鎔基「總理」於2000年3月的中外記者會上公開宣稱該條件並非新增，乃鄧小平的「老指示」後，不復再為大陸官方所強調，頗有「消聲匿跡」之勢。但在中共「國防部」於2000年10月所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仍將臺灣無限期拖延談判列為動武的可能情況之一。

中斡旋與國際資訊提供機制)與能力(智囊人才、政策研究機構、危機處理機制等)制定因應的對策。例如,在1995至1996年間臺海飛彈試射危機時,兩岸雙方幕僚與參謀早已規劃多套「劇本(Scenarios)」以因應對方可能的行動。而美國的介入與干涉,亦使海峽兩岸政府貿然採取片面行動或誤判對方意圖的機率減至最小。而「態靜」之條件亦符合兩岸雙方均有足夠的時間來觀察與研判對方新政策的意圖的事實(例如「聽其言,觀其行」),故雙方決策者均有充分時間觀察在一特定狀況發生後,對方的因應措施,再擬定己方的相應對策。亦即雙方決策者所關注的是,情況發生時,雙方各自採取應對行動交互反應後的「結果」,而不是發生該結果的動態「過程」。亦即兩岸對局的策略擬定的要件,在於比較前一均衡狀態(新政策實行前)與後一均衡狀態(新政策實行後)的利弊得失,以為是否採行該新政策的依據。此種比較靜態(Comparative Statics)方法,為社會科學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

綜觀自1993年辜汪會談後的兩岸關係之起伏發展,似乎無法不令人嘆息持臺獨理念人士使臺灣全體人民,花了整整七年多的時間,去實驗或證明,在大陸激烈「反獨」的意識形態未改變前,臺灣方面任何形式的「臺獨」嘗試,終將被迫回到原點。此一現階段「臺獨無效」之現象,絕非吾人主觀意識上的「反獨」結果,而是基於學理模型分析的客觀結論。

利用同樣的理論分析方法,我們也可得到,在臺灣大部分人民無法認同「中共即中國」、「臺灣是中共代表的中國的一部分」與「在國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臺灣」的前提下,不管中共如何施加壓力,或以動武與三通來威脅利誘,臺灣政府和大多數人民基本上無法接受中共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⁶

6. 請見註3定義。

因此，兩岸在政治外交定位問題上，在可見的未來，仍是一對局論中所謂的「奈須」僵局。⁷兩岸執政者似乎不必再浪費時間與心力冀求在短期內解決「一個中國原則」問題。因為若不從根本上改變兩岸對一個中國的認知，兩岸將持續地處於一奈須均衡的僵持狀態。在兩岸對一個中國仍然停留在意識形態之爭，或外在大環境不發生結構性的顯著改變前，兩岸政治關係的僵局應將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⁸

列寧曾說過歷史是沿著螺旋形道路前進。螺旋形就是繞圈子，有時繞了一圈又一圈，結果發現又繞回到原地。兩岸的政治定位問題，雖然經過過去七年多的角力，如今似又回到了1993年辜汪會談後的階段。但是臺灣人民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卻已提升到了另一個層次。以往強烈主張臺獨的人士，不論是民進黨的基本教義派亦或是以陳水扁為代表的「阿扁世代」，已幡然自激進臺獨心態，轉為以國家安全為前提的理性態度。兩岸關係的演進雖又回到了從前，但過去七年臺灣執政者突破中共在國際上封殺臺灣的嘗試，卻換來國際、臺灣人民，甚至中共官學界對臺灣主流民意的正視與重視。因此，過去七年李登輝總統領導下的有關兩岸關係的政策，雖無顯著的正面突破，但卻累積了許多「不試即無法確認」的寶貴經驗。至若臺灣方面獲取該些經驗的代價（包括蹉跎的時間及機會成本），則有待歷史學家作進一步

7. 有關 Nash Equilibrium 的定義與數理模式，請見 Roger B. Myerson,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91-116.

8. 對局理論的數理模型可嚴格證明，奈須均衡是一很穩定的均衡現象，請見註7定理3.1，頁95。對局雙方一旦陷入奈須均衡狀態，即無法輕易解套，除非有外力(exogenous forces)的介入，使形成原均衡狀態的要件改變。例如，臺海兩岸在1957年近似全面戰爭的「八二三炮戰」後，至中共宣佈停止「單打雙不打」式砲擊金門與馬祖前的近三十年的長期武力對峙，基本上是一奈須均衡現象。此外，1960年代至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前的以美俄兩國為首的東西兩大集團間的冷戰時期，亦是一長期奈須均衡現象。

的評估。

二、提昇「一個中國」為兩岸的共同願景

「一個中國」的實現或「中國統一」將是一個艱巨的人文與政經社會各層面的整合工程。為了消除大陸內部對民進黨政府臺獨傾向的疑慮，更為臺灣 2,300 萬人民本身的安全與利益，本研究認為應建議陳水扁總統公開宣佈：以「一個中國」做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終極「願景 (Vision)」。⁹ 本研究同時亦認為，此一願景的達成與實踐，應經過兩岸人民民意仔細論證與長期溝通。換句話說，兩岸可估量自身需要而開始有計畫、有步驟地談判與協商如何實現「一個中國」願景。此一談判與協商過程，自然應該是平等（雙方居於對等地位，任何一方不應以談判以外方式威脅對方接受其主張）與開放（不預設結論，任何議題均可談）。本節將首先討論願景的意義與功能，然後扼要介紹策略規劃理論模型，⁹ 再在理論架構下以簡化後的案例來分析比較採取「一個中國」為兩岸共同願景的適用性。

（一）願景的意義與功能

願景是一種當事者期望的概念目標，也可說是一種心理上的認知 (cognition)。願景是策略規劃者 (Strategic Planner) 想要達成卻無法立即輕易達成的終極理想。法國大革命時的「自由」(Liberty)，美國獨立戰爭時的「民有、民治、民享」均是一種既簡單卻又抽象的概念，但卻是最為人類所樂於接受的願景。願景最大的功用，就是使所有參與者與關係人 (stakeholders) 的行為與工作賦予有意義的內涵；也可提

9. 本研究中策略 (Strategy) 之定義為一組邏輯上相合且具共同長期目標的行動 (Actions) 與法則 (Rules)，此處用「策略」而非「戰略」，乃吾人認為無特定對手的非零和（不必然你死我活）之 Strategy 為策略；有特定對手之零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 Strategy 為戰略。因為並非所有總體 Strategy 都有特定敵人，例如臺灣的兩岸關係策略的 stakeholders 除了中國大陸外，還有美、日等其他國家，故應以策略而不以戰略相稱。

供所有參與者一套一致且不互相矛盾的行為準則與目標，使他們可據以發展出適合各自階段需要的「使命」與達成該些使命的相對上較具階段性且較明確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討論願景的文獻都強調，願景並不一定必須被提出該願景策略規劃者去實現，更無必要訂出實踐的時間表。例如實行社會主義是中共建國的一貫理想與最終目標，即其願景。但在中共建國五十一年後的今天，大陸依然停留在執行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西方國家以自由為願景已有數百年歷史，但追求自由仍可被視為其現在與未來的願景；因為自由的本身即為一抽象且隨時代改變的概念。陳水扁先生競選臺北市長時所用的「快樂、希望」亦可視為一不可多得、可隨時代改變而歷久彌新的願景。願景的主要功能與特質即是既抽象又簡單明瞭，更無需明白定義與界說的主觀(Subjective)理念目標。¹⁰

☞ 「一個中國」願景的意義與功能

將「一個中國」做為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景，既簡單易懂又無需明確定義，因為該願景事實上應被視為是兩岸人民主觀上的認知，不需要也無法去客觀地定義。陳水扁先生從來未曾仔細或明文定義他提出的「快樂、希望」願景，但是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應該均覺得（主觀上或心理上）瞭解該願景。美國曾有一聞名的法律案件，辯方的無罪取決於「God」是否存在；負責審理該案的法官最後判定辯方獲勝，因為在每一個美國人用的美金鈔票上，均印有「IN GOD WE TRUST」。該法官事實上並未判定或定義 God 之存在與否，而運用了心理與經驗法則，不否定 God 之存在。此案例事實上可做為願景的一個最佳詮釋與類比(Analogy)。既然最重視法律與科學的美國人民均可感性地以

¹⁰事實上，「願景」可視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主義」的摩登代號。孫中山先生對主義的定義：「一種理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可完全適用於詮釋「願景」的意義。

「IN GOD WE TRUST」為願景，相信聰明又具包容心的臺灣人民自然可在心理上說服自己接受「一個中國」為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景。

兩岸對「一個中國」之爭本來就是政治性頗高且涉及「統獨」的意識型態之爭。政治就是與現實妥協的藝術，蔣中正先生的「反攻大陸」，蔣經國先生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李登輝總統就任初期的「國家統一綱領」、中期的「戒急用忍」，以及晚期的「兩國論」，都是權衡當時的政治現實而發展出來的時代使命（在決策理論中稱作mission，即具時效性的策略目標或政策指導原則）。當時代改變了（例如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則新執政者甚有可能重新釐定新的時代使命。因此，陳水扁總統不願意蕭規曹隨地「繼承」國民黨政府的「一中各表」，而亟思擬定新的替代方案，並不令人意外。

就長遠來看，當臺灣的「新新人類」世代成為民意主流時（大約至遲在2020年左右），該時代的執政者的時代使命自然將與陳水扁總統的執政標的大為不同。因此，當代執政者若將「一個中國」的定義行諸正式文字時，則將限制未來世代對「一個中國」的發言權，更使得未來執政者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空間大為縮小。衡諸兩岸政治現實及臺灣人民的長遠利益（Inter-temporal interests），本研究建議臺灣當局應公開認同「一個中國」，但不對「一中」做任何定義與界說，此一「無定義的一個中國」可以做為兩岸關係發展策略的終極目標與理念方向。¹¹「一個中國」願景的功能性將隨兩岸人民的經濟生活水準、文化與社會的認同、政治思維的覺悟而演變與成長。我們不該也不能用我們現今狹隘的視野與對未來有限的知識去定義「一個中國」，而強迫後代遵守。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任何「一中」的定義，有其優點，也必有其不足之處。但若臺灣不定義「一中」，而由執政者主導且公開宣佈認同「一個中國」，將其做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終極願景，則臺灣執政者與人民將因不受「一個中國」有形定義的束縛，而可

¹¹ 耿慶武，「認同一中不做界定」，《聯合報》，2000年11月25日。

「萬法皆空，自由自在」地開創兩岸關係新局。

將「一個中國」作為臺灣人民心理上的認知，絕不等於向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投降，反而是將了中共時常改變詮釋「一個中國原則」事實一軍。而中共執政者也無法否認臺灣執政者將「一個中國」作為兩岸關係之願景的正確性與原則性。再者，不有形的定義「一個中國」，基本上避免了現今臺灣內部「統獨」意識型態的政治對決。其符合謝長廷所建議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架構」，也與跨黨派小組吳豐山的「三個認知」與「四個建議」相容；更包含了沈君山的「認同一中是兩岸關係未來演進方向，不是現在的統一」、洪冬桂的「兩岸目前主權與治權互不涵括，至社會基本同質後，再本一中協商定奪未來」；亦與林濁水、蔡同榮等的提議「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兩岸應簽訂和平條約」、範光群的「一中是兩岸本於平等地位，基於共存共榮、相互尊重原則，以和平方式共同建構的中國」等建議互不排斥。

「一個中國」願景也與陳水扁總統先前主張的「一個未來的中國」，以及邱進益與朱立倫主張的「一個象徵性的或虛擬的中國」相互輝映。臺灣承認但不明文定義「一個中國」，事實上是兩岸關係戰略的最高招，其一方面善意回應了中共「一個中國」的訴求，消弭中共好戰派的動武藉口，因而解決了兩岸現有的僵持關係，使兩岸關係進入另一層次；另一方面，在與中共做非政治性談判時，臺灣亦可因時、因勢、因地權衡解釋「一個中國」的內涵，以求取各階段談判的最高利益。

以「一個中國」做為兩岸的共同願景，非但可解決當前兩岸關係的僵局，同時亦可滿足大陸當局對「一個中國」的強烈訴求。而最重要的是，認知「一個中國」願景，並未使臺灣現今的主權、法律與政治地位有任何改變。事實上，自作者於2000年5月10日提出「一個中國」願景前後，¹²已有許多相似的概念被提出。陳水扁先生提出的「一個未來中國」，邱進益先生建議的「一中」象徵性理論¹³與由立

委朱立倫提出經行政院長唐飛認同的「一個虛擬中國」均與「一個中國」願景有異曲同工之妙。¹⁴但吾人認為臺灣公眾人物，尤其是政府高層人士，不應過分強調「一個中國」願景的「虛擬」成分。「一個中國」就是「一個中國」，不需再有明文的定義與其他附加的形容辭。任何試圖定義「一個中國」的嘗試，應均屬於技術層次的演練，基本上無法解決戰略層次的「一個中國」之爭議。臺灣將不附加任何有形定義的「一個中國」做為兩岸人民所追求的共同終極「概念目標」的目的，在於換取中共領導人的認同與善意回應。過分強調其「虛擬」成分，只會引起受共黨制式教育且自信心與政治地位未必堅強的大陸執政者的直覺懷疑與反感。

事實上一個好的願景，應有永遠不需要或不可能被完全實現的特性。譬如，人類自古以來即有「登天」的願景，因而有了風箏、飛機、太空船的發明與登陸月球的成功。但是該些發明與成功均應視為

12. 耿慶武，「提昇一個中國為兩岸共同願景」，《聯合報》，2000年5月10日。

13. 伍崇韜，「邱進益：民進黨應建構有關「一中」的象徵性理論」，《中國時報》，2000年5月1日。

14. 依據2000年7月8日《中國時報》記者劉添財報導，立委朱立倫以希望未來兩岸朝虛擬的一個中國方向發展為題向行政院長唐飛提出質詢。唐飛答覆時說，理論上認同「虛擬的一個中國」概念，讓未來的一個中國由和平分治、和平競和，然後走向實質的中國，不過國內對此尚亟待建立共識，政府願以開放態度討論此一議題。此外，依據2000年7月9日《中國時報》記者陳嘉宏報導，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明通表示，「一個虛擬中國」概念，和陳水扁總統曾說過有關「未來一個中國」概念，有異曲同工的地方。陳明通並進一步表示「一個虛擬中國」需要透過兩岸對話或談判的方式，才能有進一步具體落實的機會，特別在現在世界跨國合作潮流趨勢下，所謂的主權觀念，也可涵括在「整合架構」的範圍內。他舉例指出，歐盟在傳統的概念裏，並非所謂的主權國家體系，但以現在的概念角度來形容，歐盟似乎也可說是一種虛擬概念裏實際上具有主權的組織。

人類「登天」願景的階段性任務的完成，人類依然兢兢業業地在努力發明與完善其「登天」的願景。或許該願景永遠無法達成，因為「登天」的需要，隨人類科技知識的進步與人文認知的演進而改變。例如，「登月」後，人類「登天」的時代任務（即使命）已改為「太空梭計劃」、「登陸火星」與探討「黑洞」之奧秘。因為願景的這些主觀與抽象特性，使得許多具技術性或階段性的主張、目標與方法，均不適合做為一個國家大策略的願景。例如，「邦聯」之主張僅為達成一個中國願景的諸多可行方法中較可被現階段臺灣人民接受的方法之一，故僅適合作為一黨派執政的時代使命，而不適合作為一個代表海峽兩岸全體人民唯一的、排他性的願景。

臺灣與大陸的現階段政治關係經簡化後或可以表1中的「願景 使命 目標 政策」簡化後的案例的策略結構關係來分析。為了使讀者更易明瞭該模型的策略結構關係，表1中亦列出人類「登天」策略規劃與以臺獨為願景的策略規劃做為比較案例。比較與分析這些簡化後的案例，讀者或可理解以「一個中國」作為兩岸共同願景的妙處與適用性。

表 1 「願景 使命 目標 政策」策略規劃案例
Strategic Planning Model : Simplified Cases

主體	人 類	大 陸	臺 灣	臺獨人士
願 景 Vision	「登天」	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	臺灣獨立
使 命 Mission	登陸月球（60年代） 登陸火星（80與90年代） 探討黑洞（新世紀初期）	「一個中國」原則	兩岸三地共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	臺灣共和國
目 標 Goals	完善大氣航空技術 發展太空物理 發展航太科技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國統綱領及 陳水扁的「四不」	國家安全 兩國論入憲 公投入憲
政 策 Policies	登月計劃 探火星計劃 黑洞理論研究計劃	以商逼合 三通 「甚麼都可談，亦可以讓步」	逐步開放三通 經貿關係正常化 建立政治談判空間	地方執政 中央執政 控制議會 三通亦無妨
風險管理 Risk Manage- ment	預算與成果相互依存，互為因果。	若有白皮書所列條件就動武 強化國際關係逼臺妥協	「大陸不動武，臺灣不獨立」 尋求或依賴國際干預	大陸若動武，臺灣即獨立 尋求或依賴國際干預

資料來源：耿慶武，《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第二部分第十章。

參、策略規劃的理論模型：「願景 使命 目標 政策」

願景是一組織或群體的成員共有的(Collective)遠程期望與概念目標，也可說是其心理上的一種主觀認知。在策略規劃架構下，願景是策略規劃者(Strategic Planner)想要達成卻無法立即或輕易達成的終極理想。一組織因為有共同的願景才使得該組織成員的行為（生活、行

動、工作等)產生有意義的內涵。一組織因為有願景的存在,而使得該組織中的成員能夠發展出一套一致且不互相矛盾的行為準則或規範,使他們可據以擬定適合各自階段需要的「使命」與達成該些使命的相對上較具階段性且較具技術與功能性的「目標」。依據這些「目標」,規劃者或參謀人員即可擬定種種「政策」(Policies)方案以供決策者選擇。當一政策確定後,執行者自然可擬定行動計劃去執行。換句話說,經由「願景 使命 目標」三階段的策(戰)略構思與設計,政策研究者可以較明確地將本來包羅萬象的「政策空間」精簡為較小的「可執行的政策空間」(Implementable Policy Space)。然後由決策者自此一可執行的政策空間中選取一最終政策,以實際施行。

「使命」與「目標」俱屬於策略(戰略)性的大政方針,應由決策階層(Executives)如元首、內閣、國家安全會議(或大陸的政治局常委)來決定與協調;而「政策」則屬於技術性與功能性或戰術性的執行方案,應由各專業部門(如部會級首長)負責擬定與執行。就執行介面而言,「使命」與「目標」皆屬於紙上談兵的策略規劃層次,並不需大批執行人力與預算。但「政策」卻屬於戰術性且功能性較高的執行層次,非但需要考慮施行的步驟、技巧與時效,更需編製計劃,考慮資源配置與執行所需的人力與預算。

通常為施行一「政策」,負責部門需按該政策之複雜性與執行上的難易程度,將其劃分為相互關連但可分別管理與分頭執行的方案(Programs 或次政策 Sub-policies),每一方案又可按執行時序劃分為若干階段(Phases)。每一階段又可分解成若干計劃(Projects),以利有效執行與監管。每一計劃又可再分解為若干行動(Actions),每一行動則可包含若干單元工作(Works),再依這些工作的大小與規模,分派人員與分配預算,最終得以執行。

如圖 1 中所示,「願景 使命 目標 政策」策略規劃模型為決策理論的最基本模型,從早期軍事上的戰略規劃,到近代大企業所強

調的長期發展策略規劃，不乏廣泛被成功應用的實例。該策略規劃方法的優點是可以用簡單的策略架構關係，來溝通通常既複雜又需為數極多的關係人(Stakeholders)清楚瞭解的策略方針與相應的階段目標與行動準則，此一策略規劃模型更可用來有效評估一個管理者過去、現行與未來的工作績效。

臺灣與大陸的現階段政治關係經簡化後或可以表1中的策略規劃模型的結構關係來分析。為了使讀者更易明瞭該模型的結構關係，表1中亦列出人類「登天」策略規劃做為比較案例，同表亦簡單列出以臺獨為願景的策略規劃模型做為另一比較案例。

一、中共的「一個中國」策略規劃案例分析

中國共產黨以實行共產主義為其執政的一貫理想與最高原則，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五十年，卻仍然停留在「社會主義初始階段」。因此可見，中共所謂的「原則」並不是一定要立即達成的定律或規則，而是一種精神上與心理上欲達成的「使命」。若以「願景使命 目標 政策」的策略規劃模型來分析中共對兩岸關係的訴求，可明顯看出（請參考表1）：若「一個中國」是中共的願景，則在此願景指導下，發展出其時代「使命」-「一個中國原則」。¹⁵該使命可因對象的不同而內外有別，或在不同的情況下而有彈性的詮釋。例如，從中共官方發言人多次在國際上公開將臺灣視為「叛離的一省」，到大陸「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最近所說的「沒有說過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中共所倡行的「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則可視為其欲達成「一個中國原則」之時代使命所定的階段性目標(Goals)。而「不放棄使用武力」、「文攻武嚇」、「外交封殺」、「三通」則可視為為達成這些目標的方法與手段（即策略規劃模型中所稱

15. 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定義，請見註3。

的「政策」)，亦是其欲完成其時代使命與階段性目標所擬定的種種政策工具。

「使命」通常可視為對局一方在總體策略上的基本立場，雖可允許己方視事實之需要而對其作彈性詮釋或改變，但卻不可能允許對局的對方對己方的「使命」有所挑戰或否定。因為與對方協商己方的「使命」等同於放棄自身立場的「投降」。此可由中共本身可彈性詮釋「一個中國原則」，但不允許臺灣方面與其討論該原則而得以印證。陳水扁總統呼籲中共與其討論「一個中國原則」，等於要求中共修改其基本立場，因此無法獲得中共的善意回應，實不足為奇。同理，臺獨人士以建立「臺灣共和國」為其時代使命（請參考表1第四案例），則當然不願認同中共之「一個中國原則」，因為若認同該原則即等於放棄建立獨立的臺灣國之使命。此一事實，基本上妥切描述「一個中國」問題的兩難：雙方（臺獨人士與中共）均不能在「使命」層次改變己方的基本立場。

因為世局大環境的隨機性及不確定性與對手行為的多變性，任何策略規劃均無法顧及每一可能發生的事件或狀況，因此當決定採行某一策略規劃案時，自然需綢繆該策略規劃設計以外情況發生時的應變措施(Contingency Plan)，此即所謂的「風險管理」。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策略規劃的風險管理計劃，即為其一貫宣稱的「動武三條件」：若臺灣宣佈獨立、若臺灣有內部動亂與若有外國勢力介入臺灣，另加2000年發表的兩岸關係白皮書中所新增列的若臺灣無限期拖延談判即動武，其中又以臺灣獨立為中共最重要的動武條件。

因此，在中共的策略規劃下，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或許不是其主要策略目標，但卻是達成其「一個中國原則」策略下的兩大目標：「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保障措施與風險管理方法（資訊經濟學 Information Economics 中所謂的威嚇策略“Intimidating Strategy”或對局論中所謂的承諾行為）。對此，國際上與臺灣執政者自中共1995至1996年間的臺海飛彈演習後，似乎並不曾有任何誤判與懷疑。

包括李登輝與陳水扁在內的臺灣執政者在試圖突破兩岸關係或試圖尋求臺灣獨立時，亦謹慎避免觸碰該些動武條件。

就對局論而言，中共的「動武威脅」是中共在兩岸關係對局中的一個關鍵性的「承諾行為」(Commitment)。¹⁶ 其主要目的在於使臺灣方面與其他關係人（例如美日與其他東亞國家）相信，若中共的戰略目標（例如反臺獨）不能達成時，即使需付出甚高的代價，亦將不顧一切地動武。此種「動武」威脅策略會對臺灣產生威脅的唯一可能是使臺灣的決策者相信，若中共的執政者對臺灣獨立不做激烈的反應，就將受到包括被黨內政敵逼迫下臺的重大損失。因此，中共官方在其「一個中國」大戰略下，非但不可能放棄動武的「承諾」，更且會利用各種機會重申其動武的決心。因為唯有令對手（臺灣）與其他關係人（例如美國）相信此一「動武承諾」的真實性與嚴重性，此一威脅策略方始有效。反之，當臺灣不再相信中共的「動武承諾」之威脅時，該策略即再無任何價值可言。若此，則現今兩岸關係的僵持局面（奈須均衡）的一個主要基本條件將消失，從而導致該僵局的改變。同理，陳水扁的「大陸不動武，臺灣不獨立」亦可視為一威脅策略下的「承諾行為」。因為該宣示明白告訴大陸執政者其動武後所需付出的代價就是其最不願見的結果：臺灣宣佈獨立。

由另一角度觀察，因為中共明白宣示其動武條件，反而使得兩岸關係的僵持現狀更形穩定。在以美日為首的國際勢力的關切與壓力下，臺灣的新舊執政者的任何單方面走向「臺獨」的政策改變，均是

¹⁶ 對局論中的承諾行為通常均為非理性的(irrational)，對局的一方為達成其戰略目標而事先訂定或宣示在某一情況或結果發生時的必然行動（威脅策略），即使該行動需付出不合理的代價。請見 R. B. Myerson, *Game Theory: Analysis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98-412；張維迎，《博奕論與資訊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2-32。

以不直接挑戰中共的動武條件為極限。¹⁷ 因此，中共明確宣佈這些風險管理措施「動武承諾」威脅策略，反而減少了因臺灣方面誤判情況或試圖單方面突破中共種種打壓，而引起的兩岸武力衝突的不確定性，因而使得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爭議持續的呈現「奈須均衡」的僵持現象。民進黨政府希望以種種戰術性的短期政策示好，而冀圖換取中共放棄動武威脅的「善意回應」，基本上是緣木求魚，未能認清中共的基本戰略目標。

二、臺灣的「一個中國」策略規劃案例分析

利用相同的「願景 使命 目標 政策」的策略規劃理論模型，吾人亦可建立臺灣的「一個中國」願景下的策略規劃架構。由表1的第三個案例可看出，若臺灣將「一個中國」做為國家發展的終極理想，則在該理想下，現階段的時代使命可為與大陸、港澳全體同胞共同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新中國。進而可按照國家統一綱領的階段與進程，結合當時的民意及配合國際大勢與世局環境，有系統地設定階段性政策目標，如陳水扁總統所公開宣示的「四不」：不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以公投推動統獨、不廢除國統綱領或國統會的問題。雖然這些負面列舉式的政策目標敘述，不符合一般正面敘述政策目標的常規，但亦反映其政策空間的海闊天空與無歷史包袱的自由自在。

在這些「有所不為的」原則下，陳水扁總統唯一曾明確宣示的兩岸關係政策目標即是以極力避免予中共藉口動武為標的的「國家安全」。¹⁸ 再按此目標，規劃種種政策方案與執行計劃如小三通、

¹⁷ 例如，最近有兩岸關係專家指出蔡英文掌理的兩岸關係政策事實上是只做不說的兩國論。請見蘇起，〈做而不說的兩國論〉，在臺北舉辦的「追求兩岸和諧發展兩岸經貿」座談會上發表，2001年5月13日。

¹⁸ 「國家安全」也是與願景一樣有其主觀性與抽象性。各階層依其本身的利害

WTO、三通、高層會面、逐漸解除戒急用忍限制、推動簽署和平協議等政治層次較低的短期政策。在此策略規劃架構下的風險管理政策則可為：「只要中共不對臺動武，不會宣佈臺灣獨立」與尋求或依賴國際的干預。

由表1臺灣的「一個中國」策略規劃案例可看出，「保持現狀」、「訴諸國際」、「三通」與「解除敵對狀態」等對策，充其量僅能提供在階段性政策目標層次的短期戰術性目標或成為風險管理的備用方法，卻甚難做為一個健全又具持久性的策略「使命」，更根本不能解決願景(vision)或概念層次的「一個中國」問題。因此，臺灣方面任何試圖用該些技術性「方法」(Means)去換取中共改變其概念性「標的」(End)，亦即「一個中國原則」的嘗試，勢必將徒勞無功。李登輝總統執政的後期所做的種種突破兩岸關係現狀的嘗試均無功而返的最主要原因亦在此：試圖以技術層次的「戰術」去改變對方戰略層次的「使命」。

兩岸關係所以變得錯綜複雜與難解，乃因為兩岸執政者與其幕僚們時常將欲達成的「一個中國」願景與如何達成該願景的階段性使命（戰略）與短期政策目標（戰術手段）相混淆之故。譬如謀求國際支援與進入聯合國等開展臺灣外交空間的政策，充其量僅能展現臺灣在國際上的實力，而對中共在國際上圍堵臺灣的政策手段有所回應，但卻無法改變中共在策略層次的「一國兩制」的策略目標。又譬如，「邦聯」制僅是達成「一個中國」願景的諸多可能方法之一。若臺灣

關係與事實需要可對「國家安全」做出各種因時制宜的定義與界說；但同時似乎又無法完全瞭解與同意他人所定義的「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例如，股票大戶常用穩定股市以穩定社會與人心為由，認為政府應介入股市維持其穩定，以保障國家安全，此一論點自然無法為頭腦清晰的知識分子與學者接受。穩定股市或可暫時穩定執政者的政權，但其與長期的國家安全的因果關係，卻值得詳加論證。

以「邦聯」為標的來對抗大陸的「一個中國」的訴求，當然有如以橘子換蘋果，而遭到中共以不符「一個中國原則」所拒斥，自然不足為奇。但若臺灣能以有守有為的國統綱領來回應中共的「一國兩制」的訴求，並明白指出國統綱領的遠程目標本就是以統一的中國為願景，則中共方面將很難否定臺灣的此一將希望寄託於未來的訴求。

在策略規劃架構下，許多學者所建議的「邦聯」將僅只是達成「一個中國」的所有可能的方法之一，而不必然是唯一或排他的策略目標。所以，以「邦聯」做訴求，僅能達到階段性的「政策」層次，而無法成為一個可常可久的策略使命與終極願景。但若將邦聯制修改為「一國兩邦」或「一國多邦」，並以其為臺灣在一個中國願景下的階段目標，則應可成為對抗中共的「一國兩制」的利器。因此，在臺灣的「一個中國」策略規劃案例中，吾人建議以兩岸三地共建「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做為臺灣在「一個中國」願景下的時代使命。而邦聯將可視為達成此一使命的有效且可行的方法之一，即策略規劃模型中所謂的「目標」之一。

三、「臺灣獨立」策略規劃案例的適用性

雖然「臺獨」訴求可與「一個中國」居於相同的「願景」位階（見表1第四案例）。但是在現今情況下「臺獨即戰爭」，該訴求明顯違背臺灣大多數人民不欲以武力解決兩岸關係的意旨，因此以「臺獨」為終極理想的策略，至少在現階段的客觀環境下，被臺灣執政者公開宣示的可行性很低。此外，有趣且值得注意者，在以「臺獨」為願景的策略規劃架構下，短期的目標與可執行的政策，與臺灣若以「一個中國」為願景下策略規劃的「目標」與「政策」相去不遠。此觀察明白顯示，符合一向持臺獨理念的民進黨政府的可行的大陸政策，基本上是刻意模糊或盡量避免討論策略性「一個中國」議題，而試圖或冀望以小三通、WTO、全面三通、高層會面、逐漸解除戒急用忍限制等政治層次較低的短期政策，換取時間及策略空間，以伺機尋

求臺灣獨立的最佳時機。

因此，按照表 1 的策略規劃案例研究來預測，除非兩岸客觀環境有結構性的改變，陳水扁先生在未來執政期間，可執行也能執行的兩岸政策應脫不出以上政治層次較低的短期政策範圍。但是若臺灣現階段的執政者能突破對「一個中國」的狹隘解釋，而將其視為一心理上的概念性的願景，而非政治鬥爭的議題或法律名詞，則本文所建議的兩岸三地經濟整合方法，由區域合作而兩岸合組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以至於類似歐盟的兩岸經貿聯盟，即可在短期中順利開始實行。¹⁹如此，兩岸間將有至少三十年的穩健經濟合作時期，而將政治整合或統一問題留待下一世代的兩岸執政者與人民去解決。

¹⁹耿慶武，《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第二部分第九章；以及 C.W. Kenneth Keng, "An 'Economic China': A Win-win Strategy for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5, No.2, October 1998, pp.182-215.

圖 1 策略規劃模式(Strategic Planning Model)

肆、兩岸整合方式的構思

在 20 世紀末年，吾人已經目擊了諸多國家政治結構的變遷，其中以東西德的統一與蘇聯的解體為最突出的國家政治結構的統一與分

解。東西德的統一事實上提供了一個因政治因素分裂後國家再統一的實例。但是因為兩岸三地的人口與土地規模之不成比例，以及現今人民生活水準和政經社會結構的巨大懸殊，臺灣與港澳的人民自然憂慮，若與大陸立即政治統一，即等於被大陸併吞。因此東西德的統一模式能應用到現今兩岸三地的政治整合或統一的情況上的機率甚小。而蘇聯的解體卻直接刺激大陸的執政者，使之擔心，若對臺灣獨立問題不積極表態，非但有永遠失去統一臺灣的機會之虞，甚且或會間接地鼓勵大陸境內的某些區域如西藏、新疆等的獨立，而有造成大陸似蘇聯般崩解的可能。

臺灣與包括美日在內的世界各主要國家，在經歷 1995 至 1996 年間的臺海飛彈危機後，基本上對中共準備不顧一切地動用武力解決臺獨問題，應已經不存任何幻想。因此，若假設未來臺海兩岸執政者均不願主動引發軍事衝突，則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似乎僅剩下維持現狀和步向整合或統一的兩種選擇。

雖然臺灣的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人民目前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狀，²⁰但維持現狀畢竟是一短期的權宜之策，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無法永遠避免向國內、大陸及世界宣示其長期的兩岸關係政策與目標。因為若臺灣無長期兩岸關係政策，則非但將使得國內的民間投資計劃無所適從，亦將使得外國投資計劃與國際資本因臺灣的兩岸關係政策不明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太高，而躊躇不前。²¹如果國內與國外的長期投

20 依據 1997 年 9 月中山大學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抽樣調查，高達 80.3% 的臺灣民眾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狀」。贊成「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者有 34.3%，贊成「維持現狀以後再統一」者有 21.5%，贊成「永遠維持現狀」者有 13.8%，贊成「維持現狀以後獨立」者有 10.7%，贊成「儘快獨立」或「儘快統一」的民眾分別佔 9.0% 及 3.1%。請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新聞信》（合訂本第一輯）（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8 年），頁 301。

21 姑不論近年來外國對臺灣的長期投資因兩岸關係之不明朗而緩滯，即使臺灣

資與長期資本因臺灣無長期的兩岸關係政策而裹足不前，則受到負面影響的將不僅只是臺灣未來的經濟成長，其衍生出來的結果，更將使臺灣在國際上原為強勢的經貿優勢以及較弱勢的外交與安全關係均受到負面影響。因此，平穩的兩岸關係是臺灣未來經濟持續成長與穩定的必要條件，而兩岸的長期經濟整合政策將是發展平穩的兩岸關係之基礎。

世界上現有的跨國經濟整合模式或許無法直接應用到兩岸經濟整合的現實情況上，但畢竟給予吾人在探討兩岸統合的方法時許多啟發。大英國協的自願式之非政府性的文化交流模式，北美（美加墨）自由貿易區(NAFTA)模式的經濟整合，以及歐盟的多國經濟同盟模式，有甚多地方適應用到兩岸現階段的文經交流與未來的經濟合作情況。²²

本地的企業與投資者，近年來為避免長期投資臺灣地區的風險，而轉為短期投資（如炒賣房地產與投資某些回收期較短的服務業）或變現性較高的財務投資（如股票與期貨）。臺灣近年來民間新投資結構的改變，應與臺灣的長期兩岸經濟關係政策的不明有極大的關係。

22 對於經濟整合的理論與實務經驗，請見耿慶武，《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第二部分第九章。國內常年以來討論兩岸整合關係多偏重於政治層面，例如吳新興，《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的研究》（臺北：五南書局，1995年）；丘宏達，〈國中有國 兩岸統一新模式〉，《聯合報》，2000年11月6日；丘宏達，〈邦聯制 選擇統一的可行模式〉，《聯合報》，2001年7月8日；魏鏞，〈國民黨需要「邦聯」嗎？〉，《聯合報》，2001年6月30日；饒穎奇，〈階段性最佳設計：邦聯制 可突破兩岸僵局〉，《聯合報》，2001年7月4日；沈富雄，〈邦聯論 對政黨競爭、政治整合的良性引導〉，《中國時報》，2001年7月4日。此與國內負責與研究兩岸關係事務人士以政法背景出身的學者與專家為主流有絕對的因果關係。本文作者絕對贊同：若兩岸政治統合關係解決，經濟關係自然不成問題。但若政治關係是奈須均衡僵局，則建立兩岸間的經濟整合關係，可視為打破兩岸政治關係僵局的一個先決條件。

本研究建議臺海兩岸應可採行一演進式與開放式的整合方法：先協商區域經濟整合，再視區域經濟整合的經驗與成果，決定是否進行或如何進行下一階段的整合談判。此方法的「演進式」特點指出，兩岸三地可視其本身的需要，先自經濟與社會結構開始，一項一項地與對方談判，以分別達成各項的共同協議，最終可使得兩岸的所有經濟事務，在經由一個雙方共同認知的經濟與社會體制下協調、合作與和諧運行。此一演進式的統一談判過程，將給予兩岸人民與政府充分的心理準備與調整時間，而所達成的協議必定是對雙方均有利的協議，因此永遠是「雙贏」。²³兩岸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的大多事務上達成協議以後，則可視屆時兩岸人民的需要與意願，再決定是否或如何從事兩岸的政治統合。

演進開放式統合方法的另一特點是確認兩岸的統合是一漫長的過程。在此一漫長的整合過程中，不論是兩岸的政治生態、經濟與社會結構，以及人民心態或是世界局勢與國際關係，均或將產生無法預知的變化，因此與其草率地預定未知的整合時間與議題，不若採取更切合實際的自然演進的整合方式。未來回合的談判議題應該建立在過去回合談判的協議與現今雙方之需要的基礎上。所以，兩岸的整合過

²³不論傳統的比較利益理論(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或近年發展的「新貿易理論」(the New Trade Theory)，請見 E. Helpman and P.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Boston: MIT Press, 1985)。均明白指出，自由貿易與自由投資式的區域經濟整合乃一正和對局(Positive-sum Game)，所有參加者均可因經濟規模、市場占有率、資源使用效率與生產力的增加而獲得額外的經濟效益。「新貿易理論」並進一步提倡政府介入某些產業的發展，以使該些產業在某些市場享有「先行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s)」的競爭優勢，請見 Paul Krugman, "Does the New Trade Theory Require New Trade Policy?" *World Economy*, Vol.15, No.4, 1992, pp.423-441。

程，應只有規劃性的階段，而不必事先預定時間表，因為談判雙方均無法預知未來談判的結果與所需的時間。吾人建議的演進且開放式的統一過程，事實上與大陸過去二十年來，在無法預知「改革開放」的進度與結果時所採行的「摸著石頭過河」政策制定原則相同。

一、兩岸經濟整合的階段

本研究所建議的兩岸經濟整合或統一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中華國協」非政府性的文經交流階段、「中華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與共同市場階段，以及「中華聯盟」貨幣與經濟政策同盟階段。吾人估計，兩岸三地自今起至少需要三十年的時間談判協商與合作，²⁴方能達成此三階段的文化交流與經濟整合。若兩岸三地誠能達成此三階段的文化經濟與社會層面的整合，則屆時將可視實際情況的需要，再行決定是否或如何進行政治上的統一。因此，兩岸協商政治上統合，應該是 21 世紀 30 年代的議題。三十年後，臺海兩岸的執政者與絕大多數人民，應將均是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出生或成長的世代，而中國大陸亦將已完成初步現代化。屆時，兩岸的執政者與人民對「一個中國」或「統一」的看法與心態或將不再似現今般的包含濃厚對立色彩的意識型態之爭，甚至「統一」或將不再是最受兩岸人民所重視的當務之急了。

(一)第一階段：中華國協(The Chinese Commonwealth)

在解決涉及官方的任何經貿協定的談判之前，臺灣、香港、澳門甚至可考慮包括蒙古、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文化地緣相近或華人眾多的國家可與大陸聯合成立一自願的、非政治性的，以及非政府的以文化交流與人文關懷為主旨的「中華國協」(The Chinese Commonwealth)。其性質與結構均可與「大英國協」相似。在中華國協的架構下，每一會員體（國家或地區）仍保有其在國際上原有的政經與社會

²⁴詳見下小節，「兩岸經濟整合的時程」中的分析。

地位，但可與其他會員體協調合作從事所有非政治性與非政府性的組織、事務與活動。例如，在此一文化交流與人文合作階段，兩岸可推動以大陸正在形成中的九個大都會經濟圈與香港、澳門所形成的港澳經濟區，以及以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與金門、馬祖所組成的臺灣經濟區為基本單位，組成「中華區域經濟協會」(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es)，或以兩岸三地的大城市為單位組成「中華城市協會」(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Cities)，從事經濟區對經濟區或城市對城市的交流與合作。如此，兩岸三地可在不牽涉中央政府及國家主權行使的爭議下，加強有組織的、民間的、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與人文社會的整合。上述地區性組織可定期舉辦運動會、學術與專業研討會，亦可成立各種基金會，有組織、有步驟地促進各地區間的人文與社會各階層的交流與合作。

在此階段，兩岸亦可在國際上合作爭取共同的利益。譬如，臺灣與大陸的奧運委員會可聯合爭取北京市主辦 2008 年奧運會，以換取該奧運會的部分比賽例如空手道、棒球等適合在異地舉行的會外賽在臺灣舉行，或亦可換取大陸支援未來的亞運會在臺灣舉行。此外，兩岸除可加強雙邊的科技、學術、教育等方面的合作外，亦可合作主辦各種國際性的經貿科技專業會議與各種學術會議。兩岸更可合作研究華語拼音系統的一致化、漢字電腦內碼(computer internal code)的相容或統一、整理及出版（或上網）中國古籍、聯合研究中國傳統醫藥，以及建立聯合華文圖書館與資料庫的電腦連網等等。當然，現在已有的體育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培訓選手，更應可加強與加大規模。北京政府亦應可主動支援臺灣參加無政治性（或低政治性）但對兩岸人民均有益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環保組織等等，以示北京對臺灣人民的善意，以軟化臺灣人民對大陸的戒心與敵意。而臺灣民間更可以運用其雄厚的財力與先進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協助大陸的教育體系與社會發展的現代化。兩岸亦可就環境保護、核電安全與廢料處理等互利項目展開合作。

在此階段，兩岸政府部門，可藉共同參加的國際組織如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等機構的溝通管道與協調機能，開始試探政府機構間的溝通與合作。例如，兩岸可試探聯合主辦或分別主辦該些機構年會的可行性。當然，兩岸即將同時加入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更將提供兩岸經貿機構與官員的直接會談管道與平臺，而逐漸奠定進入下一階段的政府對政府的兩岸經貿關係協商，中華國協階段亦可視作兩岸談判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準備階段。

□第二階段：中華自由貿易區(The Chinese Free Trade Area)

兩岸三地在非官方的「中華國協」階段所累積的文經交流經驗與建立的各種社會關係，將逐漸消弭兩岸間的意識型態、心理與經濟社會上的各種猜疑與差異，使得兩岸人民更互相瞭解與包容，而適合進一步地從事規模較大也較正式的協調與合作。兩岸間最為需要且最具實質效果的正式合作，應該是須由政府對政府的談判方能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雙方協議在一定的時間內取消所有臺港澳與大陸地區間的直接（關稅）與間接（非關稅）的貿易與投資障礙，使得該些地區間的一般商品與服務可自由流通與公平競爭。兩岸在設立「無障礙貿易區」達成後，仍可在这一架構下繼續協商建立關稅同盟與共同市場，以便「中華自由貿易區」內的所有生產要素、物資與商品、資本、資訊、技術與服務均能自由流通，而使得兩岸全體人民享受最高的經濟福利。

如果中國大陸希望如其十五年長期計劃中所預期，在2010年時達成初步工業化，則其經濟發展的第一優先必需為有效利用一切資源，使其經濟持續高速成長。臺灣的資本、技術、管理經驗與國際行銷網絡將是大陸經濟成長的極大助力，亦可視作大陸維持未來高速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就臺灣方面而言，如果臺灣希望在新世紀初年，建設臺灣為科技島、綠色矽島及全球運籌中心，則臺灣當局無法不以發展平穩互惠的兩岸經貿關係為優先考慮。此外，臺灣廠商與企業也無法擔負喪失大陸廣大市場的損失與機會成本。同時，臺灣也需要大批廉

價的原料、礦產與基礎勞工。因此兩岸均有充分的誘因，即早建立自由貿易區。²⁵

臺港澳與大陸間若能達成自由貿易協定，非但將使該些區域內的所有經貿、服務與投資行為的交易成本大為降低，更將使該些區域的政府與民間各階層，因執行自由貿易政策而更緊密地協調與合作。此外，自由貿易區的成立與執行，更需要所有參與地區政府在法令與制度上某種程度的調整或相容。譬如，為了保障商品貿易的自由，臺港澳與大陸地區必定得修訂其國內有關經濟及生產的法令與條規，使得商品的規格、質量標準，以及生產廠商的衛生與環保標準、包裝規格與運輸標準等相容或一致化；為了保障區域間的公平競爭，各地區的政府必須合作訂定最基本的保護童工規定、勞工福利標準、政府直接與間接補貼的限制、廣告與資訊的自由流通標準、商標與商譽保護制度、金融與保險服務的標準、交通與通訊的安全規格與標準等等。此外為了減少貿易的障礙與摩擦，各地區的政府亦需要修改其有關規章法令，設立具公信力的仲裁機構，處理各種貿易爭議（如仿冒、傾銷、智慧財產權保護等），以及訂定簡單、具時效且透明的仲裁程序。

兩岸三地的「中華自由貿易區」階段的經濟整合過程，又可分為一般商品與服務的自由貿易、資本勞務與資訊技術的自由貿易（共同市場），以及對外關稅同盟等進程。當「中」港臺地區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由商品自由貿易而進入各種服務業自由貿易後，兩岸三地政府自可進一步協商籌劃關稅同盟，使得大中華地區的對外貿易關稅一致。單一的對外關稅，除對內可強化與保障中華自由貿易區內各成員間的

25. 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理論基礎，請見註 24 文獻及其所引用的文獻。有關兩岸經濟整合方式與時程請見 C.W. Kenneth Keng, "An Economic China: A Win-win Strategy for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5, No.2, October 1998, pp.182-215.

貿易自由與公平競爭外；在國際上，亦可保障區內人民與廠商的的最高權益與經濟利益。此外，在一般商品與服務的自由貿易區建立後，兩岸三地自可進一步協商資本、勞工、資訊、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區內的自由流通。此將使自由貿易區內的所有政府間的協調與合作更上層樓，而進入協商整合兩岸三地的法律制度與社會結構層次。譬如，勞工的自由流動，將涉及兩岸三地的戶口制度、出入境法規、勞工保險、所得稅制等制度的調整與相容。兩岸三地的產業規格、衛生標準與環保法規、交通規則與通訊標準、社會安全與福利標準、商業法律與公證、仲裁制度等，亦均需逐漸的調整至相容或一致。

非常明顯地，在兩岸三地共建中華自由貿易區階段，兩岸三地政府間的直接接觸與談判將無法避免。但此階段仍可視為「技術層次」與「事務層次」的政府與政府接觸階段。談判的主題應該著重於經濟與社會制度的相容與一致化。在自由貿易區談判過程中，兩岸三地政府仍可擱置或低調處理兩岸政府對政治性較高的主權之爭議，而在尊重對方治權的基礎上，進行協調、溝通與談判。兩岸政府甚至可透過適當的立法與授權，交由非政府機構（如海基會與海協會）來談判。所達成的協議，可經由兩岸的適當立法、形成政府政策或由政府以行政命令來執行。此階段政府間的接觸與社會各階層間的溝通與建立相互信任，事實上與《國統綱領》的中程「互信合作」階段的目標一致。

㊟第三階段：中華聯盟(The Chinese Union)

當兩岸達成自由貿易區、對外關稅同盟與共同市場等較「事務性」的經濟合作後，兩岸應已具備進一步從事政府間政策的協調與合作的能力與環境。屆時，兩岸三地的政府應可考慮進一步的經濟整合：資本市場與金融市場的整合，利率與匯率政策的協調，以及最終的貨幣統一與財稅政策協作(Policy Coordination)。兩岸三地亦可籌組中華聯盟的中央銀行，監督與規範兩岸三地的金融市場的穩健；亦可共同集資成立大中華開發銀行，綜理大中華區域內的整體投資與經濟

發展所需的資金調度。

在此階段，兩岸三地亦應可考慮籌組類似歐洲聯盟般的由人民直選的「中華議會」(The Chinese Parliament)，作為「中華聯盟」的立法主體並監督聯盟的行政與政策的制定及執行；設立由兩岸三地政府的有關部長所組成的「中華聯盟理事會」(The Council of the Chinese Union)，為聯盟的政策制定單位；成立超地區並獨立於兩岸三地政府的「中華聯盟秘書處」，綜理聯盟的一切日常行政事務；以及成立「中華聯盟法院」，主理一切跨地區的爭議與司法工作。這些機構的組成將是兩岸三地邁向某種形式的政治統合的嘗試，雖然吾人仍認為「中華聯盟」應為類似歐洲聯盟般的以經濟整合為主要目標的多個主權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聯盟。兩岸三地在完成中華聯盟的建設後，應該已達成經濟的完全整合與社會的相互融合。屆時，兩岸三地的人民自然可考慮是否或如何進行進一步的政治上的統合。

二、兩岸經濟整合的時程

在達成經濟上的完全整合後，兩岸三地可視當時的國際環境與國內人民的需要，來決定是否從事政治上的統合，或以何種方式（邦聯、聯邦、亦或單一國家？）來從事政治上的統合。雖然以現今的知識與資訊，尚無法判斷或預測兩岸三地何時才能達到此一協商政治統合的時機與環境，但若以美加墨的自由貿易協定所訂的自協定簽署時起十五年內完成消除區內所有關稅為準，²⁶則兩岸三地的「中華自由貿易區」階段似不應少於此時程。此外，歐洲諸國花費四十年以上的時間，協商與通過歐洲聯盟的成立。²⁷兩岸三地雖有歐盟的前車之鑑可循，但因兩岸的敵對歷史以及現今仍有的經濟與社會差距，兩岸似亦

26. 雖然1994年元月一日生效的NAFTA規定在十年內取消美加墨三國間99%的關稅，但若以1989年元月一日生效的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日算起，則至少需十五年方能完成美加間所有關稅的消除。

應花費至少與歐盟各國相同的時間來協商建立「中華聯盟」。若以1987年臺灣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為兩岸雙向交流的開始，則兩岸三地合組「中華聯盟」成功的時間，似應在2027年以後。

因為兩岸三地自1987年起迄今已有十四年的時間開展非官方的文經交流，因此吾人對「中華國協」的非官方但制度化的文經交流階段的達成，抱以較樂觀的預期。若臺灣與大陸能在新世紀的前五年內達成「中華國協」的協議，則兩岸三地應有可能在2010年前簽署《中華自由貿易協定》，而在2025年前後應可協商實現合組「中華聯盟」。因此，吾人預估兩岸三地的政治統合，最早應在2030年代成為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實質協商的課題。圖2展示本研究對兩岸文經交流、經貿整合與政治統合時程的預期與估計。

到2030年時，絕大多數曾經歷1940年代國共內戰的中國人應均已離開人世，兩岸的執政者都將換為受教育及成長於兩岸重新開始雙向交流(1987年)以後的世代。屆時，兩岸的政治環境或將大不同於目前，而且兩岸三地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差異亦將較目前大為縮小。當大中華經濟圈內的各種差異逐漸消失時，兩岸的政治統合是否仍像目前一樣受到兩岸執政者與人民在意識型態上的重視，則不得而知。因此，如圖2所示，雖然在2030年代，兩岸應將已具備協商政治統合的客觀條件與環境，但兩岸是否實際進行政治統合，仍須視當時兩岸執政者與人民的主觀意識與客觀需要而定。此乃為何本研究認為，兩岸

27. 若自1951年，法國、西德、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和荷蘭簽署巴黎條約成立「歐洲煤暨鋼鐵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算起，迄1991年歐洲共同體各國領袖在馬斯垂克(Maastricht)簽署條約，決定成立「歐洲聯盟」，恰為四十年；若算至1992年12月31日生效的歐洲單一(共同)市場，則為四十一年；若算至1999年1月1日生效的歐洲單一貨幣，則為四十七年。對於歐洲聯盟的組織與成長過程，請見耿慶武，《中國區域經濟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第二部分第九章。

三地的政治統合是一無法預設結論的開放式的演進過程。任何以目前的經驗、資訊、知識與意識型態所做的宣示、預測或規劃，似應均為主事者現今主觀的期望、臆想與蠡測，故應不具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實質的說服力。換句話說，本文認為在兩岸間達成某種程度的經濟整合前，奢談兩岸間政治整合，似乎過度考量法理與政治權力的分配（霸道統合？），而未能充分考量兩岸人民人文融合所需的時間與自然過程（王道融合？）。

（收件：2001年7月11日，修正：2001年9月18日，採用：2001年10月11日）

A Win-win Solution to the “One China” Dilemma

C.W. Kenneth Keng

(Director, Asia Pacific Executive Programs,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pplies strategic planning model under the game theoretic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One China” dilemma of the current cross Taiwan Strait relations. It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hina is in a state of Nash Equilibrium – there is both sides could implement no better alternative strategies unless some of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change.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One China” strategies from China’s, Taiwan’s and “Taiwan Independence’s” prospective using simplified strategic planning cases. It shows unambiguously that the current China policies exercised by President Chen’s government are mainly of short-term tactical nature, they are unlikely able to make any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strategic stan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analysis also suggests that it is unlikely China would ever alter its position of using military power as her last resort if Taiwan declares independence. Because that “threatening” strategy would work only if China makes every principal stakeholders (Taiwan as well as

U.S.A., Japan, etc.) to believe that China is fully committed to it indeed. The paper therefore suggests that the least-cost solution, both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is to avoid the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howdown (of sovereignty issues, for instance) and move on to pragmatic issues. The paper thus proposes a “win-win” strategy of espousing an adaptive and open-ended process toward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Maca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the so called Greater China). Using experiences of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s analogie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at it would take about another thirty years for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consolidate their economic systems as well as their social structures.

Keywords: One China issue, Cross-strait relations, Nash Equilibrium, Strategic Planning Models, economic integration